

《大捷——台儿庄战役实录》评介

何仲山

1987年,为纪念抗日战争爆发50周年,笔者与林治波、赵国章两位同志曾合写过一本《血战台儿庄》(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这是建国后我国第一本反映台儿庄战役的著作。但由于这本书只有11万字,篇幅较小,加之当时资料缺乏,所以关于台儿庄战役的若干重要问题,书中未能涉及或未能充分展开论述。

在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之际,林治波、赵国章两位同志应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之约,撰写了《大捷——台儿庄战役实录》(以下简称《大捷》),作为对抗战胜利50周年的献礼。笔者高兴地看到,这本洋洋25万言的著作不仅在篇幅上大大超过《血战台儿庄》,而且在学术水平上也有了明显的提高,不愧为一部“推陈出新”的著作。

笔者以为,《大捷》的推陈出新主要表现在以下问题上:

第一,将池淮阻击战作为台儿庄战役的起点,并以此为基础对台儿庄战役的起止时间、参战兵力、战绩及伤亡做了重新统计分析。

史学界一般认为,台儿庄战役的序幕战只有临沂、滕县之役,而不包括池淮阻击战。《大捷》作者认为,池淮阻击战与临沂战役和滕县保卫战一样,都是台儿庄战役的序幕战,并且是最早的序幕战,也就是台儿庄战役的起点。作者的理由有三条:(一)池淮阻击战的目的是将津浦路南段日军阻于淮河南岸,以防其北上夹击台

儿庄、徐州。没有池淮阻击战的胜利,就不会有后来的台儿庄大捷。(二)从台儿庄战役的全盘作战构想来看,李宗仁的第一个步骤是将津浦路南段日军阻于淮河以南,使南北日军失去呼应;第二步,再将津浦路北段日军左翼第五师团阻于临沂,使其左翼第十师团陷于孤立;然后将该部诱至台儿庄一带,围而歼之。可见,将北上日军阻于淮河以南,是李宗仁全盘作战计划中的头一个步骤。将池淮阻击战视为台儿庄战役的序幕战,有助于人们从整体上理解李宗仁的作战构想。(三)从李宗仁本人的观点看,他曾说:“南北两路都是敌军的精锐……以猛虎扑羊之势,向徐州夹攻。孰知竟一阻于明光,再挫于临沂,三阻于滕县,最后至台儿庄决战,竟一败涂地……”这里,李宗仁将明光、临沂、滕县相提并论,等于承认池淮阻击战同临、滕之役一样,都是台儿庄战役的序幕战。笔者认为,作者的分析是能够成立的,至少称得上一家之言。

作者据此观点,认为台儿庄战役应从1938年1月15日日军进攻明光算起,至4月7日日军全部逃离台儿庄结束。在此期间,中国军队共有33个师另2个旅、1个骑兵团、2个炮兵团投入战斗,总兵力达29万余人。日军参战兵力为第十师团濑谷支队、第五师团坂本支队和第十三师团,总兵力5.2万余人。交战结果,中国军队历经池淮、临沂、滕县、台儿庄等役及枣峰、临城、韩庄、汶上、济宁等零星战斗,共歼敌2万余人,自身伤亡5万余人。这就为读者勾画了台儿庄战役的大致轮廓。

第二,披露了台儿庄大战决策和发起的内幕情况。

以往史学界对此问题缺乏详实记录。《大捷》依据台湾新近印行的《徐永昌日记》披露了有关细节:3月21日,蒋介石在武汉主持会议,决定对津浦线北段之敌取攻势,并向李宗仁下达了攻击令;但次日的会议又决定“暂缓进攻”,改取守势。仅一夜之隔,何以有如此之变?作者估计与白崇禧、徐永昌的态度有关。因为徐的日

记中有这样的记载：白崇禧“不主德邻(李)军力战，以为在一地纵力战亦守不了一星期，不如预备游击之力量为得计”。至于徐永昌一人，更认为“全国无能战之军”，对于向日军进攻持十分慎重的态度。这两位“重臣”的想法大概对蒋不无影响。做出了“暂缓进攻”的决定后，蒋介石电令李宗仁停止进攻临城、峄县之敌，并于24日偕白、徐二人北上抵达徐州。但李宗仁不为所动，照计划向日军发起了进攻。他向蒋介石的解释是：与前方指挥官不通电话，命令无法追回，前方已经打开了，故无法中止进攻。蒋介石见李执意要打，且进攻命令原出于自己之口，故不便硬令停战，只好默许了李的开战。闻名中外的台儿庄大战就这样在李宗仁的坚持下打响了。作者分析，李之“无法追回命令”实非不能，而不愿也。战区与前方指挥官即使不通电话，也可用无线电逐级取得联络，如李肯做，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李之所以坚持开战，想必与其强烈的主战态度有关。据徐的日记记载，在1938年1月6日的军事会议上，李是主战最坚者。在此之前，曾怒斥了徐永昌的主和观点。李的主战之坚由此可见。故其“不受君命”，打开大战，实乃顺理成章之事。作者对上述细节的披露和分析，让读者了解到新的情况，很有意思。

第三，突出了临沂战役不仅是台儿庄战役最重要的序幕战，而且是台儿庄战役的主战役之一。

该役之所以重要，缘于三个因素：（一）临沂战役的胜利是台儿庄大捷的前提，张自忠、庞炳勋两军如不能将第五师团阻于临沂，那么台儿庄方面根本无法集中兵力对第十师团实施合围。如果说台儿庄战役是正面战场的第一个大胜利，临沂战役则开台儿庄大捷之先河，也可以说是正面战场最早的胜利战役，其意义非同反响。（二）既然第五师团与第十师团同为该役中国军队主要对手，那么谁也没有理由把阻击第五师团一个多月并歼灭其5500多人的临沂战役仅仅视为序幕战和外围战，临沂毫无疑问地是独立于台

儿庄方面的另一主战场。(三)由于临沂方面中国军队参战兵力较少,故该方面作战强度不比台儿庄方面弱,其所付之代价与台儿庄方面相较毫不逊色。

笔者认为,这个问题过去史学界有所忽视,将临沂战役的意义埋没在台儿庄大捷之中了。《大捷》对临沂战役重要地位的阐述是必要的和公正的。

第四,深入剖析了汤恩伯保存实力的劣迹,从而解决了一个史学界有争议的问题。

虽然李宗仁在其回忆录中指责了汤恩伯违抗军令、保存实力的做法,但由于汤的有意掩饰,研究者在有关的资料中很难看出其抗命自保的蛛丝马迹。在1993年的台儿庄大战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有人对李宗仁的说法提出了质疑。作者对大量第一手资料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证实汤恩伯在台儿庄战役中的确存在着违抗军令、保存实力的问题。其大致情形是:汤部开赴鲁南后,先是拒不遵命增援滕县,导致滕县失守;尔后将部队隐伏于山区,按兵不动,致使五战区“枣峰计划”告吹;再往后,又拒不执行南下命令,使台儿庄守军徒增重大伤亡;及至发起总攻,又拖延避战,直到蒋介石来电督促,汤部才真正行动起来。由于汤恩伯的一再拖延和敷衍,台儿庄战役的进程至少被延误一周之久。作者指出,汤恩伯的违抗军令、保存实力,根源于“私心”二字,由于私心太重,汤氏不仅不能顾全大局,善待友军,甚至对自己的部下也不能一视同仁。由这个事例,进而说明蒋介石的用人之道大成问题。作者对这一问题的考察十分细致、深入、可靠,具有很强的说服力。笔者还注意到,作者在批评汤恩伯的同时,并不否定汤部广大官兵对于战役胜利的重要贡献,注意了分寸的把握,这是值得肯定的。

第五,首次记录了中国空军、炮兵、装甲兵对战役的贡献。

参加台儿庄战役的中国特种部队有空军第三大队(辖第七、第

八中队), 炮兵第四团, 炮兵第七团第一、第二营, 第二师炮兵第五十二团第八连, 铁甲车第三中队, 他们的参战有力地配合了步兵的作战行动。《大捷》不仅将上述部队列入中国军队战斗序列表, 而且在正文中对他们所使用的兵器的数量、性能、作战行动与配合效果都尽可能地做了记录和说明。这是过去所没有做到的。

第六, 对日本右翼学者的否定论进行了有力驳斥。

从七八十年代以来, 日本右翼势力关于侵华战争的翻案文章多得数不胜数, 这其中就包括了台儿庄战役。日本防卫厅研究所教官森松俊夫撰写的《“日本军台儿庄大败”的真相》声称, 那些直接参加过这场战争的官兵们说: “我们对那场战争有的是‘激战’或‘苦战’的感觉, 完全没有败北的感觉。因此当听到说‘你们打败了’的时候, 他们感到奇怪和愤慨……”该文的结论是: “我弄清了认为‘打败了’的作家是在对事实有误解或在对事实缺乏深入了解的情况下, 而又受到中国方面宣传材料的影响所造成的。”作者依据战役的基本史实, 从濑谷支队撤退的理由, 临沂战局和坂本支队的去向, 濑谷支队长的违抗军令, 濑谷、坂本支队的战役企图, 日军统帅部的意图和日军撤退的狼狈相共 6 个方面, 一一进行了剖析揭露和逻辑辩驳, 从而有力地说明, 日军在台儿庄战役中的撤退是真正的败退, 决非“主动退却”。作者还特别谈到, 森松俊夫为掩盖日军在台儿庄战败的真相, 特地引用郭沫若先生在《洪波曲》中的一段话, 用以佐证日军的所谓“主动撤退”。本书作者为此做了专门的分析, 指出: 郭老否定台儿庄大捷的那段话是在 1948 年反蒋的特殊政治背景下写就的, 与当年的事实确有出入。因为, 该文轻易断定日军是主动地从台儿庄作战略撤退, 却不能解释日军从河北沿津浦路大举南犯, 气势汹汹, 一路得手之际, 为何要突然来一个“战略撤退”? 某些日本人将郭老这番不足为据的评论视为救命稻草, 企图借此掩盖其丢脸的失败, 这只能暴露其用心不良和手段之

拙劣。笔者认为,在一部专论台儿庄战役的专著中对这个问题作出严正辩驳,是非常必要的。作者的论证雄辩而符合事实,分量十足。

第七,由战役结局阐发理性思考。

战史研究的最终目的并不是弄清战争的过程,而是从这一过程中总结出具有借鉴价值的经验教训来。所以,作者十分重视对台儿庄战役的经验教训的研究和阐述,举凡该役的历史意义、中国军队的致胜之道及该役留下的种种遗憾与教训等等,书中均有论述。其中第四章第二目“从速胜论到持久论”尤其值得注意。作者指出:台儿庄大捷的欢庆规模之大、影响之广,在抗战期间绝无仅有。这种局面的形成,一方面有其合理的因素,另一方面也与国民党当局的刻意渲染有关。说其合理,是因为该役是在正面战场屡战屡败的险恶形势下取得的第一次大胜利,既然是第一次,又是万众所期,其意义自然非同寻常。但对台儿庄大捷的宣传也存在着夸大胜利和刻意渲染的成分。在屡战屡败、士气低落的情况下,这种宣传会起到振奋民心、鼓舞士气的作用;但一旦超过了适宜的限度,反会产生误导舆论的不良后果。速胜论的抬头和蔓延就是过度宣传所导致的最大恶果。在速胜论的支配下,蒋介石错误地调动大量精锐部队向徐州地区集结,企图与日军决一雌雄。此举险些酿成大祸。作者在分析资料的基础上还顺便谈到,在台儿庄大捷后盲目决战的问题上,李宗仁先生是力主者而非反对派,故也负有一定责任。这是一个新的观点。由于速胜论导致徐州会战的迅速失败,进而引发抗战阵营的深入思考,这一思考的最重要的成果就是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作者深刻指出,由台儿庄大捷引发的速胜论,对后来的抗日作战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但其错并不在台儿庄战役本身。台儿庄大捷本身是一件好事,但由于不能加以正确的认识,反而酿出不良后果;而徐州会战的失败,却使许多人变得清醒起来,心悦诚服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持久战思想,从而推动了抗战的进程。这从

正反两方面体现了事物发展转化的辩证法;同时也告诫人们,必须以正确的态度去看待胜利和失败,否则就只能是事与愿违,适得其反。这一结论精辟客观,十分中肯。

第八,最大限度地使用了有关资料特别是第一手资料。

这是《大捷》将台儿庄战役的研究向前推进进一步的基础。本书的撰写,参考了50余种文献资料和100多篇学术论文,凡是有关的资料作者几乎一览无余。其中最重要的第一手文献档案资料包括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辑的《台儿庄战役资料选编》《台儿庄战役期间李宗仁密电选》和《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以及台北近代史所印行的《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徐永昌日记》和《王世杰日记》等。第一手资料的使用,使本书的各种统计数字,如参战兵力、歼敌数字和伤亡数字等,更为准确。本书对台儿庄战役重要史实的考证和种种新观点的提出,也都是作者研究新资料的成果。

另外,《大捷》的写作手法也颇值得称道。一方面,作者不是拘泥于战役本身,而是把战役放在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之中加以反映,这使得读者容易把握台儿庄战役在宏观历史格局中的地位。另一方面,作者在记述战役的同时,又十分注意反映人物与战役的关系,把人物的命运、品格、智慧与战役的进程联系起来,既叙事又写人。这种宏观上挂靠历史背景,微观上联系人物命运的写作手法,正是本书血肉丰满、趣味横生的奥秘所在。

不过,从更高的要求来说,《大捷》也还存在一些不足。第一章在介绍李宗仁时,兼及两广事变等问题,扯得稍远了一点。某些观点,如台儿庄战役从池淮阻击战开始,虽属不乏新意的一家之言,但能否为学术界广泛接受,尚未可知。书中的个别说法前后不一。如汤恩伯第二十军团,前面说兵力有7万人,后面则说约有6万人,究竟多少应有一个准确的说法。笔者认为,考虑到该部此前曾参加南口战役等作战,有一定伤亡,6万余人的说法更确切一些。

本书附录一中国军队战斗序列表,可能因排版的原因,部队隶属关系多处出现错乱现象。如二十军团与五十九军,二十一集团军与五十一军,三集团军与九十二军、七十五军,均为平行关系,互不隶属,但在书中却成了隶属关系。附录二日军战斗序列表也有类似情况。本书如能再版,以上问题希望加以修正。

(作者何仲山,1943 年生,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

(责任编辑:李仲明)

台湾金禾出版社《国际视野丛书》评介

徐 勇

由台湾实业家郭俊铎先生策划并主持,台湾金禾出版社自90年代初推出《国际视野丛书》,到1998年为止,已连续出版各种著作(含译作)近20部。该丛书以现代中日关系和战时日本为主题,关涉美、苏、中等国对日政策,战后各大国关系,战前日本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的社会状况,日本战争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罪行(包括战俘、慰安妇历史等)诸方面重大课题。该丛书的出版,是为中国抗日战争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战后国际关系史、现代中日关系史诸学术领域增添的又一批重要成果,为史家和广大读者提供了很好的参考书。笔者依据初步的阅读感受特作简要介绍,以飨读者。

该丛书综合来看有以下特点:

第一,丛书选题鲜明而集中,多为政治、经济、文化领域重大的专门问题,或是针对一些分歧性问题提出新的材料与看法,有些论题填补了学术研究空白。第二,丛书各部专著都具有厚实的资料基础,不仅专著本身具有很大说服力,而且通过出版披露了一批难见的档案材料,如当事人多年的亲身经历,或有学术价值的日记,或各方面的档案材料。第三,丛书大部分作者是西方和日本学者,有的专著是首次公开发表,有的已是英、日文种中很有影响的专著。通过丛书译介为中文,促进了东西文化交流,并帮助国人拓宽视野,加深对西方和日本观点的了解。第四,丛书各部专著持论公正,